

是誰搞臭了後現代

◎ 曹怡平

後現代已經不是甚麼新鮮名詞了，在傳媒的極力渲染下，這個本來顯得很高深的哲學術語瞬間以光速傳播開來，電視上專家學者們熱火朝天地談論周星馳如何地後現代，王家衛的電影有怎麼樣地體現了後現代的一系列創作意圖，甚至還有的說法更加離奇，城市也因此在這些人的描述下變得日益後現代化了。

可甚麼才是後現代呢？後現代也許是我們現今討論最充分，但仍沒有討論清楚的問題。為甚麼在現代主義發展的道路上，會半路殺出個後現代，取代了現代主義的絕對統治和管控地位？按照尼采的說法，在他那個年代的所有「巨集達敘事」全部都處在崩潰的狀態中。尼采和利奧塔爾兩人都對他們時代佔統治地位的「宏達敘事」的崩潰持歡迎態度，他們認為那些敘事實際上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下，因而最終是非常有害的。

那麼那些「宏達敘事」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按照大衛·羅奧遜的理解，現代性社會被定義為以二元對立思維為特徵的現代思維方式：個體與群體、精神與肉體、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科學與精神、理性與價值、理智與情感的分離與對立，都是現代性的集中表現。

後現代所要超越的，後現代思想家所要抵抗的，就是這種二元思維下構建起來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傳統，這種傳統與現代性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傳統相對立，試圖追問現代性的各種假定，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人與世界、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係。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因為晦澀而導致了普遍的誤解，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充滿了顛覆性，更多的人看到的是這種顛覆性的後果：世界因而變得更加破碎、不確定和非聖化。但他們沒有看到德里達之所以要顛覆形形色色的現代霸權和佔統治地位的二元對立思維，其目的就是為了差異，為他者，為弱小者爭取生存的空間。柯布在這個問題上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後現代思想的一個主要原則是包容，是讓不同的社群和團體發出聲音。」

對後現代發展的軌跡做一個簡單的邏輯梳理，我們可以隱約感覺到，後現代給我們許諾的世界也許並非是鮮花滿地，牛羊滿山奔跑的理想世界，但其較之於現代主義，確實有長足的進步。在這樣的世界中，按照柯布的說法，「後現代主義者使差異有了立足之地」。而德里達更認為，「對他者的尊重是唯一的倫理律令」。設身處地和換位思考一直是後現代思想家推崇的原則。

這樣看來，相比較於現代主義的霸道本質和高高在上，後現代無論如何顯得更加和藹可親和容易接近。從哲學意義的後現代來看，後現代主義許諾的世界比現代主義所創造出來的二元對立的世界有更大的彈性和容忍度。按照哲學意義的後現代主義推論下去，其將引領我們到達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一種類似於烏托邦的大同世界。這種大同世界裏有諸多不一致的聲音，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在一個入口極其寬鬆的世界入口裏，現代主義所不能容忍和鼓

勵的行為，將被視為常態的而受人理解和尊重。

然而，當後現代致力於挖倒現代主義牆角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並不完全是後現代主義者所許諾的大同世界——一個真正的，而不是口頭意義的求同存異的世界的誕生，甚至在將近百年的後現代建設中，我們也沒有看到些微的光影，來給我們足夠的勇氣以繼續傳說中美好的事業。

讓·鮑德里亞曾經悲觀地預言：「我們的後現代似乎非常可能變成一個精神空虛和文化膚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社會實踐被無盡地重複和拙劣的模仿，世界被分裂，個體遭異化，個人沒有任何自我感或歷史感，仿佛是成千上萬個電視頻道。」讓·鮑德里亞敏銳而準確的描述出當下文化背景下的大眾處境，現實中的後現代正如同他的預言演進下去，這個後現代世界越來越朝擬像的方向大步邁過去，現實與表面之間的差別日已消失，現代公民不再是甚麼超人——而僅僅是一個沒有能指符號世界中的媒體消費者而已。

如果我們稍微把歷史稍微往回拉一點，把過去到現在的路徑重拾起來，也許可以理解讓·鮑德里亞為何有這樣悲觀的言論的。資本主義在不長的時間裏用機器和商業文明取代了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整個歐洲社會因此而出現了「非精神化」的趨勢。尼采對於技術統治人的後果極為警惕，他警告說：「印刷、機器、鐵路、電報是前提，還沒有人敢於由之引出貫穿數千年的結論。」尼采一再指出，機器剝奪了人的個性：「他把許多人變成一部機器，又把每個人變成達到某個目的的工具」；「它製造平庸和單調」；「它是無個性的，我們現在似乎只是生活在無名無姓的、無個性的奴隸制度下」。

尼采站在後現代的大門外，以天才的預見力觀察到今後世界將會出現的走向。尼采的思路沿著兩條路徑展開。其一是商業對文化的影響，其二是技術對文明的改變。後現代的展開應該是在兩個層面上同時進行的，在學術上，哲學對現代主義的解構，是要從根本上解體現代主義的絕對統治地位。因此，後現代思想小心的避開絕對價值、堅實的認識論基礎、總體的政治眼光、關於歷史的宏大敘事和封閉的概念體系。它是懷疑論的、開放的、相對主義和多元論的，讚美分裂而不是協調、破碎而不是整體、異質而不是單一。

而商業意義上的後現代，出自一種商人盈利的本能衝動，表現出一種對深度的放棄，即對崇高感、悲劇感、使命感、責任感的懷疑和疏離，在過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聖東西，如深度、焦慮、恐懼、永恆的情感等都消失殆盡，而被世俗夢想和文化遊戲所代替。與此同時，商人成為「支配現代人類心靈的力量」，商業成了「文化的靈魂」，市場價值決定也抹殺了一切精神事物的價值。於是，報刊支配社會，記者取代天才，藝術淪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人的機器化和文化的商業化使尼采悲歎：「大平庸是時代的危險。」

而更為重要的也許來自技術對後現代的影響。在尼采的時代，技術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與一百年後的時代相比，中間產生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關於技術的進步神速，海德格爾這樣論述道：「我們詩意的生息地，可是當那生長過蕎麥的土地，那以詩作為歌唱的大地，變成了柏油路，變成了石頭堆砌的圍牆，變成了每小時二百多公里飛速賓士的高速路，我們該怎麼樣收攏我們的靈魂？」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讓人無所適從，而且也使尼采對技術文明的觀察有所偏差。

尼采對科技本身對文明的影響持相同的看法，即無論是代表印刷文化的印刷術，還是代表鏡像文化的大眾傳媒（當然，在尼采的年代，只存在電報這種非典型的雛形），他都持同樣的批判態度。其實從尼采含混和模糊的表達中，我們大體可以推論出，他認為技術和商業的結

合導致了後現代一些列特徵的出現。

尼采堅信，對科學的樸素天真的崇拜可能很快成為基督教的世俗替代品。但科學只是人類的一種有限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它不可能創造一系列連貫的價值。認識到科學的局限性反過來將導致人類深深的幻滅感和悲觀的虛無主義，這就是今天現代世界的處境。科學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人類能夠賴以生活的價值之源，這是上帝死後最讓人感到悲戚的事情。而作為精神上饑餓的、喪失了創造原動力的現代人，出於本能的衰竭、精神的空虛和匆忙的勞作，匆忙投入到藝術中尋找麻醉和刺激。藝術的主要使命因此淪為為身心衰竭的現代人提供官能上、精神上的刺激劑和麻醉劑。

這些論述本身有相當合理性，但尼采的局限在於沒有看到其實媒介作為一種傳播資訊的方式，在和不同科技結合的情況下，其實會產生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不同的表達的。尼爾·波茲曼認為技術並不是中性的，他以印刷術為例論證了技術和傳媒結合後帶來的整個世界的一系列變化：「印刷術樹立了個體現代意識，卻毀滅了中世紀的集體感和統一感；印刷術創造了散文，卻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奇異的表達形式；印刷術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卻把宗教變成了迷信；印刷術幫助了國家民族的成長，卻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近乎致命的狹隘情感。」

而電視媒介的出現，也以其不同的技術傾向改變著世界。電視媒介通過鏡像文化創造出的是一個沒有關聯、沒有語境、沒有歷史和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人們習慣了用趣味性代替複雜而連貫的思想；在這樣一個沒有連續性、沒有意義的世界裏，既不要求，也不允許我們做任何事情。

大眾文化就這樣在商業和技術更新的合謀下被催生出來。電子媒介如細菌繁殖般地用圖像符號替代了抽象符號，由於圖像消除了人們的知覺與符號之間的距離，因而也消除了文字那種需要通過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間接性，消除了從符號的所指到能指之間的思維過程。電子傳媒的這一“優勢”使它不僅替代了印刷媒介的權威地位，而且迅速地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人們越來越滿足於不假思索地接受外來資訊，越來越迷戀於直觀的複製形象而不願意進行個人的閱讀或思辯，越來越關注流動的現象而不是恒定的主體。郝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的預言不幸成為現實：人們在這種友好和善的文化中由於享樂而失去了自由，我們的文化最終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我們之所以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其原因在於哲學對深度的解構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狀態，而商業對深度的放棄卻在技術和傳媒的合力下，日益把我們的文化變得支離破碎和膚淺無聊。兩個層面上的後現代其實在角力的過程中，並不是旗鼓相當的。哲學意義上的後現代在動態的競爭中遠遠落後於商業意義上的後現代，這導致了後現代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猶如馬車的車輪，一邊完好如初的車輪還在不知疲倦、通宵達旦地駛向理想國，而另一邊還未完工的车輪在不堪重負地前行。問題在於，我們並不知道前方的哪個拐角處潛藏著無法預料的故事，會讓我們在信心百倍地向前衝的時候跌得人仰馬翻。又或者，在技術帶動下根本無法停下來思考的我們，早已忘記了為甚麼我們會這麼快，以及我們要到哪里去。

大眾傳媒造就一種娛樂致死的文化，大笑過度本身是一件及其嚴肅的事件。我們的文化因為太關注如何取悅觀眾，最終導致了文化的虛弱和衰竭。我們在空洞的笑聲後忘記了自己為甚麼要發笑以及為甚麼我們不再思考。

到這裏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後現代一路走來背的罵名中有必然的成分，比如商業和技術合謀

造就的大眾文化，當然也有些是誤會了的地方，比如哲學家對後現代的理想構建並沒有得以深入人心的推廣。那麼，對這種發展不平衡以及在動態的衝突中佈滿陷阱的後現代叢林中前行的文化，隨時可能一不小心就落入。到了最後，我們的任務也許不是要追究到底是誰搞臭了後現代，關注的焦點也許應該放在到底如何拯救我們的後現代。

在《一九八四年》中，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惡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郝黎則擔心，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在過度娛樂化的今天，我們也癡狂地參與到這場全球化的娛樂盛筵中，奧威爾的預言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遙遠，而已經實現並且正在向縱深程度不斷發展的是豪胥黎的預言。

曹怡平 經濟與政治學院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三期 2006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三期（2006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